

电影《四渡》： 银幕重现“用兵真如神”

本报记者 苗 春

深观察
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6月26日，聚焦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的电影《四渡》公映，引发广泛关注。

1935年春，3万中央红军在40万敌军围追堵截之下四渡赤水，跳出包围圈，完成战略转移。这段历史此前已有电影《四渡赤水》、电视剧《长征》等作品呈现。此次，《四渡》努力以电影语言重现“用兵真如神”。

创新电影手法

电影如何将毛泽东“用兵真如神”的宏大战略，转化为视觉语言？《四渡》摄制组精心制作了一款微型沙盘，艺术再现川黔滇边境复杂险峻的山脉与河谷，又引入特制针孔摄像机，深入模型内部。拍摄时，当刘烨饰演的毛主席运筹帷幄，手持旗子前伸，针孔镜头便紧随其手势猛烈推进，沿逼真的山脊线与河道走势急速穿梭，让观众理解战略不断变化的过程。

影片还通过巧妙的镜头调度，通过红蓝分镜，将娄山关战斗高潮阶段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指挥空间并置呈现，其他人物都被隐去，直观强化两人隔空的心理对峙。导演徐展雄富于想象力的镜头语言，对演员提出了极高要求。饰演刘伯承的曹炳琨透露，拍摄时场景需拼合，演员必须严密配合镜头节奏。原本读剧本时让他觉得难以落地的调度，最终通过反复排练做到了“严丝合缝”。

遵义会议场景的拍摄也凝聚了主创的大量心血。监制刘伟强逐一核对会议旧址中每位历史人物的座位，以邓小平为“视点人物”，通过其目光观察其他人物的交锋；刘伟强运用“预演工作法”，使主演提前明确节奏；徐展雄则采用多机位同时拍摄，将原本需两天拍摄的戏份压缩至大半日，让演员一气呵成完成对手戏；而且众角色各展其态，使这场关乎



▲电影《四渡》海报。



▲电影《四渡》剧照。

本文配图由出品方提供

红军命运的关键会议在张弛有度的表演中高效完成。

塑造立体角色

这是刘烨第三次饰演毛泽东。为了贴近当时红军缺衣少粮的状态，他进组前减重17斤。影片开场是一个大特写长镜头——硝烟弥漫，满地是牺牲的战士，毛泽东徒手抓起燃烧的红旗试图灭火。当时正在下雨，道具组在旗帜上涂了助燃的油，刘烨的手被狠狠烫了一下。那一刻，真实的疼痛与人物内心的悲愤交织在一起，外化出的表情细腻而真实，被完整保留在镜头中。

为了寻找人物细节，平时并不吃辣的刘烨还专门琢磨起毛泽东吃辣椒的习惯。在拍摄遵义会议时，他一边咀嚼辣椒一边思考，被辣得口腔剧痛、胃里像着了火，却没有喊停，而是将这种生理刺激转化成人物沉默思索、酝酿爆发的状态。

饰演周恩来的王雷从造型进入角色。长征时期的周恩来蓄须，每天化妆时，造型师都要花两三个小时，一根根为他贴上眉毛和胡须。王雷为角色设计了捋胡子的动作，在他看来，这一时期周恩来最重要的品质，是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，以及勇于担当的精神。

饰演朱德的王志飞从生活习惯中寻找人物感觉。开拍前，他特意换上一双磨损严重的老布鞋，休息时也背着手在片场踱步，体会总司令沉稳的性格。他还向摄制组提供了一个细节：朱德曾长期在云贵川生活，对当地地形十分熟悉，这一优势也在四渡赤水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第一次饰演刘伯承的曹炳琨，每天都要进行眼部特效化妆，以还原刘伯承受伤后的眼部状态。随着拍摄深入，他逐渐理解了这位人物既是熟读兵法的儒将，也是爱护士兵、言谈风趣的统帅。

影片还塑造了一组普通红军战士群像。于适饰演的连长赵德发，承担着连接战略决策与前线战斗的重要作用；王天辰饰演的指导员朱会永能文能武，既调解战士之间的矛盾，也教大家识字；王雨甜饰演的郭闻信信仰坚定，刚毅中带着柔软；谷嘉诚饰演的罗兴山性格开朗、爱吃刺梨，为残酷战争增添了一抹温暖色彩；拍摄时只有13岁的夏子轩饰演流浪儿阿金，完成了一个少年从跟着红军“混口饭吃”到成长为红军战士的蜕变。

蒋介石的饰演者王耀庆，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完

成特效化妆和头套造型，他希望呈现这位棋局另一端指挥者的心境。林永健饰演贵州军阀王家烈，把人物的尴尬处境、草莽气质和无奈感演绎得极具层次。

追寻先烈足迹

刘伟强说，拍《四渡》，“你就要真的跳进去，跟红军一起走一走，把自己投入到那段历史里”。徐展雄也说：“我们的剧本是用脚，在贵州的山山水水间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”

摄制组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，跑了32个取景地，覆盖107个场景，包括遵义会议旧址、娄山关、青杠坡、茅台渡口、土城古镇等。主创们的足迹遍及赤水河两岸，其中，让徐展雄印象最深的是苟坝会议原址那条“毛泽东小道”。90多年前，毛泽东正是在这条小道上手提马灯，在春寒料峭的深夜去长五间找周恩来。徐展雄说，这是他到贵州最想踏足的地方之一。“毛泽东在漆黑的深夜里，提着一盏散发微光的马灯前行的孤独身影，便成为《四渡》的核心意象和创作原点。”

影片的拍摄周期恰好与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历史时段重合，也赶上了贵州初春阴雨连绵的天气，又湿又冷，衣服仿佛拧得出水。刘烨说，有一场山顶夜戏拍了5个小时，没遮没挡，他和曹炳琨穿着保暖衣都受不了。“对我们来说只是四五个小时，当年的革命先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这种感受是看剧本、看历史书无法替代的。”王雷说，有时看到群演站在片场的泥潭里、冰冷的水中，有的穿着草鞋，有的甚至赤脚完成拍摄，他就会想，“当时红军战士身上有伤，还流着鲜血，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他们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？”一些年轻演员也表示，站在潮湿、泥泞、弥漫着烟火气味的环境里，身体会给出最直接的反应。

为了追求真实感，摄制组服装部门也下了很大功夫，根据战士兵种区分补丁与磨损位置。加之全程在泥泞湿冷的山地实景拍摄，演员行军、作战时自然沾满泥土炭灰，脸上、衣缝、指甲里的泥污都力求呈现真实状态。

拍摄期间，徐展雄感触很深的是，当地人对四渡赤水的故事非常熟悉，司机、饭店老板等都“如数家珍，而且有强烈的自豪感”。90多年前的这段历史，一直留存在这片土地上。

国家图书馆藏顾方舟视频口述史料完整公布——

讲述糖丸爷爷的“一生一事”

本报记者 黄敬惟

你吃过“糖丸”吗？这颗小小的药丸，是不少人童年打针后的“甜蜜回忆”。它是“人民科学家”、病毒学家顾方舟带领团队研制的脊髓灰质炎（小儿麻痹症）疫苗，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，更让中国在2000年实现了“无脊灰目标”，进入无脊髓灰质炎时代。

今年是“糖丸爷爷”顾方舟诞辰100周年。顾方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已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系列纪念活动。2026—2027年，中国、法国、意大利等地将联合举办顾方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。这份跨越国界的认可，源于这位中国科学家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，为护佑全球亿万儿童健康所作出的巨大贡献。

“我们每个人都受惠于他，应该了解他曾付出了什么。”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副研究馆员、《一生一事：顾方舟口述史》作者范瑞婷说。范瑞婷是顾方舟口述史的采访人，顾方舟的谦逊令她印象深刻：“当时，顾老听说我们要采访，以为是想要宣传他，本欲谢绝。但当她得知我们是想把他们这代人的研究记录下来，作为史料永久保存、留给后代时，他答应了。”

2013年10月至2014年7月，国家图书馆中国记

忆项目中心对顾方舟进行口述史采访。“当时是在顾老家的阳台上采访他，每次时长约1个小时，一共采访了13次。”范瑞婷说。2015年11月，工作人员又对顾方舟本人进行了补充采访，还采访了他的爱人李以亮女士。目前，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已累计形成系统、完整的顾方舟先生口述史料，时长逾15小时。

“1964年全国脊髓灰质炎病例超4万例，该病死亡率达发病人数的三分之一，残疾率更占三分之二。如果没有‘糖丸’，1965年到2000年的35年里，或将有超140万孩子患病。”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净思说，“如今，在顾方舟亲手创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，一代代科研人员继承其理想与遗志，从未停下疫苗优化与技术革新的脚步，将护佑儿童健康的使命传承下来。”

“我总觉得，父亲既熟悉又陌生。”在女儿顾晓曼眼里，父亲留给自己的多是工作的身影。直到长大，她才渐渐明白，父亲的沉默里藏着一代人的使命。“看到这么多人想要了解‘糖丸’的历史、了解父亲这一代人，我特别感动。”顾晓曼说。

“30多年过去了，提起老师，还是一个‘怕’字。”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彭小忠

说。1993年，他成为顾方舟的博士生。这种“怕”，实则源于顾方舟对科学的敬畏和对“为人民办实事”的严谨。在彭小忠的记忆里，顾老的“严厉”对事不对人，一个实验数据不准，必须重做；所有知识，必须把握得分毫不差。

“一个人活着不是光为自己，还是要为大众。本来医学就是为老百姓服务，认准了这一条是对的，是国家需要的，就一干到底。”顾方舟说。对于这位拯救了无数孩子的“糖丸爷爷”来说，“一生一事”或许是最好的人生注脚。

目前，国家图书馆官网已上线纪念专题页面，为读者打开一扇系统了解顾方舟的窗口。页面集中呈现顾方舟生平年表、相关文献、重要新闻报道等，并首次完整发布国家图书馆藏顾方舟视频口述史料。在这里，读者可以听到顾方舟亲口讲述：当年为何选择学医，如何在苏联学习期间关注脊灰，糖丸的诞生经历了怎样的波折，以及他对“一生一事”的朴素理解。

据悉，增订纪念版《一生一事：顾方舟口述史》也将面世。该版本补充了顾方舟家人的口述实录，修订了顾方舟年谱、学术成果及重要报道目录，为科研工作者和公众提供一份兼具史料价值与精神力量的读本。

文化只眼

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普及，大模型已悄然进入文学创作等场景。然而，使用过大模型辅助文字创作的人

会普遍感到：尽管大模型熟谙书信、散文、公文、理论文章等各种文体写作，却难以创作出像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

里手写家书那种饱含真情、直击人心的文字。这背后不不只是审美的差距，更包含着人机创作底层逻辑的分野。

倘若让AI仿写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的家书，从形式层面看，它不会有太多硬伤：句式通顺、章法工整、逻辑连贯、修辞完备。看似无可挑剔，但细细品读就会发觉，这些文字工整有余、真诚不足，形式完美、温度缺失。

AI写作之所以难以复刻“给阿嬷的情书”，根源在于大模型的底层运行逻辑。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海量语料资源，通过多层神经网络对字词组合、句式搭配、段落结构等进行海量学习与概率拟合，最终根据概率形成逐字输出、逐句拼接的生成模式。整个过程是纯形式、纯数理的计算过程。

从符号学视角看，AI所生成的文字，只停留于语言符号的“能指”层面。尽管它可以熟练运用各种修辞表达，却无法建立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的映射关系，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“所指”。也就是说，AI笔下的思念与牵挂，只是语料库中高频句式的排列组合，并不对应具体的人、具体的事与具体的心境。

人类书写从来都是先感于心、后发于文，先有真实的生活沉淀与情感浸润，才思如泉涌、落笔成文。人类创作，生活是源，文字是流；体验是根，情感是魂。AI写作却与之相反，它不需要经历人间冷暖，也不需要体会悲欢离合，只是基于概率机器的形式化生产。因此，它所生成的文字，没有现实场景的支撑，没有真情实感的浸润，更没有个体生命的独特印记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不仅让我们感动于先辈的爱情，更看到了目前AI创作的局限与人的独特优势。在人机协同日益常态化的今天，真正决定一件作品能否打动人的，不是机器算法，而是人的参与、思考与打磨，或者说是人的认知与创意劳动。人类经过深思熟虑的认知劳动与创作，可以约束AI泛化空阔的概率生成，打破机器的拼接思路，让原本悬浮的符号表达，对接真实的场景与情理，并转变为有真情、有灵魂的文本。

今天，我们追问为何AI写不出“给阿嬷的情书”，本质上是在追问智能时代文学创作的本质何在、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何在、人文表达的价值何在。面向未来，智能创作必然深度融入文学创作、文艺生产、文化传播等各个领域。我们既要拥抱数字变革，让人工智能服务创作、助力表达；更要坚守人类主体性，重视认知和创意劳动的核心价值。唯有立足人的生活、投入人的思考、倾注人的真情、沉淀人的劳动，智能创作才能消解冰冷的机器质感，获得鲜活的生命力。

（作者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）

台州乱弹《我的大陈岛》 再登国家大剧院



▲《我的大陈岛》剧照。

刘 方摄

本报电（记者赖睿）7月4日，为纪念大陈岛垦荒70周年，由浙江台州乱弹剧团创排的台州乱弹现代戏《我的大陈岛》完成打磨升级，再度献演国家大剧院。当晚，国家大剧院戏剧场座无虚席，再次打磨后的《我的大陈岛》在人物刻画、唱腔设计上更为细腻，演员的演绎也更多了几分沉淀后的从容，再现了70年前那段动人心弦的垦荒岁月。

1956年到1960年，为响应“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”的号召，5批467名垦荒队员先后来到大陈岛，用青春和汗水让荒芜的海岛重现勃勃生机。

2016年，浙江台州乱弹剧团筹措创排现代戏《我的大陈岛》，将垦荒故事搬上戏曲舞台，以台州乱弹特有的艺术风格，生动再现了垦荒队员“艰苦创业、奋发图强、无私奉献、开拓创新”的大陈岛垦荒精神。2019年4月，《我的大陈岛》首次公演；2021年5月，该戏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。

“今年是大陈岛垦荒70周年，再次打磨上演《我的大陈岛》意义非凡。”《我的大陈岛》出品人、导演尚文波说，“从《我的大陈岛》创排至今，正好十年。十年磨一剑，我们希望能以更高标准的艺术追求，把这部戏打造成具有历史价值、时代价值、艺术价值的精品力作。”

《我的大陈岛》自创排以来，先后荣获田汉戏剧剧本奖·一等奖、浙江省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第十四届浙江省戏剧节新剧目大奖等多个奖项。

台州乱弹是台州唯一地方剧种，距今约400年历史，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浙江台州乱弹剧团自建立以来，已复排、创排19本大戏和40多出折子戏。

据悉，《我的大陈岛》国家大剧院演出之后，浙江台州乱弹剧团还将携这部戏再次登上大陈岛，为岛上居民和游客演出。

如果大模型写『给阿嬷的情书』，会缺什么？

李凌